

# 论严复对中国传统翻译 会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熊辛格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白热化时期,随着以严复译著为代表的一批学术刊物的出现,更加快了文化转型的步伐。严复的译著别具一格,充分突显了晚清译者的意识形态和翻译诉求。通过对严译《社会通论》的分析,探讨严复翻译会通思想的渊源与中西批判、集思广益、求实创新思想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地了解严复翻译思想发展形成的动机和发展原因。

**关键词:**严复;翻译会通;《社会通论》;继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5)05-0116-04

## 1 绪论

严复最著名的理论当属“信·达·雅”,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一套更加具体的理论思想。然而,通过分析严复的一些话语,我们知道他的翻译思想不仅只有“信·达·雅”,而且包含着更加深刻的内容。透过严复的译本,大概推断出严复翻译思想的内容,即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比附会通西方文化,旨在最好地传递中心思想。那么,严复翻译思想中所指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哪些?对严复翻译会通思想的形成带来什么影响?目前,对于严复翻译研究局限于翻译策略和宏观角度的讨论,没有结合更多的译本分析其渊源与发展的原因。张德让提出严复的翻译会通思想结合了中国传统思想,具有一定的辩证逻辑。张景华从译名的角度分析了严复翻译会通思想的特点,认为其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那么严复翻译会通思想的渊源和及其发展原因值得进一步地商议。

## 2 严复翻译会通思想的继承

严复的翻译会通思想与中国佛经早期的格义翻译和明末的耶儒合译有必然的联系。诚如严复所说,“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sup>[1]</sup>这与佛经初入中土和明末耶儒合译的情况类似,新传入的文化必然受到本土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严复不得不运用类似佛经格译的比附方法和明末科技翻译的会通的方法,用中国传统文化解释一些人们不熟悉的词语和概念。

### 2.1 继承佛经早期翻译

严复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解释西学的概念,使其更易于被理解。鲁迅评价严复的翻译为,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sup>[1]</sup>。汉唐译经的方法便是格义,这种方法流行于魏晋时期佛教初传中土之时,当时一些外来僧侣为使中国人了解佛学教义,采用了中国传统术语、名词来解释佛学教理的做法。

佛经初期的翻译方法主要是口授笔录式的直译,比附和援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来解释佛教理论的格译等。所谓格译,就是借助译入语文化传统,解释原语,以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新概念。面对本土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排斥,选择借助本土文化的权威,采用比附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来减少译本文化传播的阻力无疑是一种妥协的行为。例如,安世高把“色,受,想,形,识”五类构成人的因素译为“五阴”;支谦把“般若”(智慧)译作“大明”,“波罗蜜”(到彼岸)译作“度无极”。这些译文则出自于《老子》<sup>[2]</sup>。

严复在翻译《社会通论》中关于国家的相关概念时,运用了类似于前者翻译的策略,借用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来比附解释信概念。例如,甄克思介绍国家概念:

(1)ST: “Men as a rule, live in these communities, not because they choose to do so, but because they are born into them; and, until quite recently,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change them at their pleasure. In their most advanced forms, we call these communities States.”<sup>[3]</sup>

TT: “夫国家之为社会也,常成于天演,实异于人为,一也;民之入之,非其所自择,不能以意为去留,其得自择去留,特至逝世而后尔耳,然而非常道,二也;为人道所不可离,必各有所专属,三也;其关乎吾生最切,养生送死之宁顺,身心品地之高卑,皆从其物而影响,四也;为古今人类群力群策所扶持,莫不力求其强立而美善,五也。此五者,皆他社会之所无,而国家之所独具者。是故,国单则曰国双称则曰国家者,最完成尊大之社会也。”<sup>[3]</sup>

不难看出,甄克思对国家的定义只包含前两个因素,而严复的译文却增加了后面三个因素,变为五个因素。其后三个的大概意思是,国家要推行仁政,爱天下所有子民犹如爱自己的儿女一般。甄克思在书中仅仅介绍了国家组成的条件和国民,而严复用儒家的仁学来解释甄克思定义的国家,使它在译文中具有了家天下的内涵意义。

## 2.2 继承明末耶儒翻译策略

另一方面,明末兴起西学东渐之风,许多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通过翻译西方的天文和地理等知识,来传播天主教的思想。随着翻译经验的增加,传教士们要求在粗达言义的基础上,运用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即道家 and 儒家文化,来修饰和解释西方科学术语,并且在其中添加了许多注解。更重要的是,明末提出的功利翻译,超越了汉唐译经的局限,带有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影响了严复的翻译会通思想。例如,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援引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会通基督学,使其更有说服力。如,“吾天主,乃古经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校社之礼,以事上帝也。”<sup>[2]</sup>利玛窦用“上帝”翻译“天主”使中国传统文学形象与基督形象结合,达到了比附解释的效果。

在《社会通论》中随处可见严复这样的翻译手法,严复通过运用儒家和道家的知识,解释西方的观念,以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

(2)ST: “One of the most skillful of those appeals was the appropriation by the kings of the characters and attributes of the tribal chief whom they had conquered or dispossessed.”<sup>[3]</sup>

TT: “创业王者,以战胜取威固矣,然使民心不附,则其势不可长而终倾。夫民心之归附,不可强而致者也,即行仁义以抚循之,其事亦未必皆效,则于是有至巧之术焉。”<sup>[3]</sup>

严复的译文与原文有很大的出入,他按照国人阅读的习惯,先将定义确定,然后再运用儒家思想,对主权与民心的关系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译文很好地迎合了目的语读者的习惯,而且减小主流意识形态的阻力,有利于新思想的传播。虽然严复已完全改写了原文,但是它的社会功能却被放大了。

明末大学士徐光启结合自身的翻译经验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思想主张<sup>[2]</sup>。徐光启不仅提到翻译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该如何翻译才好的策略。根据徐光启所处历史时代背景的特点,他所指的会通即传教士和大学士比附合译的策略。由于明末传教士中文能力并不熟练,而大学士们西学知识也不够精湛,他们采取中西学士合译的方法完成西学的译写。尽管,严复比附达旨

的翻译方法和利玛窦等人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严复的翻译会通思想在创新意识和批判意识上较他们更加进步。

### 3 严复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发展

根据翻译行为主义者的观点,翻译是译者在种种制约因素影响下做出的具体抉择<sup>[4]</sup>。换言之,译者的意识形态影响其翻译操作,思想观念则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复不仅经常采取会通中西的翻译策略向读者介绍中西文化的异同,同时又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严复的翻译观有两大特点:一是摄取精华,剥离糟粕;二是兼容古今,会通中西<sup>[5]</sup>。前者揭示严复翻译观的功利性,后者是严复翻译观的体现。严复在继承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晚清的社会背景,为了更好地表述其政治诉求,从三个方面发展了自己的翻译思想。

首先,是中西批判的翻译策略。中西批判的翻译策略指译者通过对比分析中西文化的差异,批判中西文化间的缺点。它不仅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重在追求目的地语文化读者的接受程度,而且带有一定的文化排斥性。如,严复在对比宗法社会制度和军国社会制度时,运用了中西批判的翻译方法。严复认为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民族主义的体现。民族主义的排外是宗法社会的本质特征,而军国社会是以扩充人民为富国强兵之策。

(3)ST: “Modern states are really anxious to increase their numbers as much as possible, because they know that an increase of numbers means an increase of wealth and of fighting – power.”<sup>[3]</sup>

TT:“盖今之为政者,莫不知必民众而后有富国强兵之效。古人以种杂为讳者,而欧人则以撙合为进种最利之图,欧洲无排外之事。”<sup>[3]</sup>

严复在译文中通过中西批判的翻译策略,增加了中国宗法社会与欧洲社会民族主义的对比,他认为清朝的腐败落后,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满汉无法融合一体,互相厮杀缠斗。严复在随后的评论中更主张反对盲目的崇洋媚外。严复的中西批判翻译策略包括了对比分析和举例评论,属于归化的策略。中西批判翻译策略是从文化层面上追求翻译的功利主义效果,所以严复没有拘泥于文字层面的刻意对等。严复灵活运用中西批判的策略,在读者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达到了文化沟通,思想启蒙的效果。

其次,集思广益的翻译思想指译者通过借鉴经典文化,来更好地阐释原著的思想,以求获得思想共鸣。集思广益翻译思想的特点是通过借鉴大量相关或相似信息,激发读者的认知共鸣,最后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例如,在第三章介绍宗法社会父权统治的特点时,严复采用了集思广义的翻译策略,将甄克思的批判思想扩大并结合了中国社会的特点。

(4)ST: “The principles upon which patriarchal society is conducted require, as we shall see, the existence of groups presided over and controlled by the well – nigh despotic authority of a male ancestor.”<sup>[3]</sup>

TT:“方民为宗法之社会也,其承宗之丈夫,为始祖之代表,所以统御其家人者,其权恒最重。其始家也,浸假则衍为小宗,为大宗。大宗之视小宗,犹严君之于家人也。”<sup>[3]</sup>

严复的译文拓展了原文中‘male ancestor’的意义。严复在译文中将它们译为“丈夫”,而原文的意思是“男性祖先”。显然,严复的译文扩大并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宗族制文化。译文有两层含义需要表达,第一,是继承家族权利的丈夫才具有资格,一般普通的丈夫没有这个权利;第二,继承家族权利的丈夫并不是直接以个人身份来行使这项权利,而是作为家族的代表。从这两点体现了严复集思广义思想的思维过程 and 操作方法。由于中西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严复在领悟甄克思大意后,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添加了许多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和典故,使得译文读起来更像是中国人创作的文章。

最后,求实创新翻译思想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译者不仅参与了叙述而且还参与了创作,其核心是创新。例如,严复认为只要把人民的自立精神和自立能力培养出来,国家就会越来越富强,即使总统换人也没有关系。

(5)ST: “That is to say, the local authorities are genuinely chosen by the people whom they have to govern; they are not bound at every step to seek instruction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o long as they act within their legal powers, they cannot be interfered with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sup>[3]</sup>

TT:“地方自治之权最重而实,盖事势所趋,非人力也。真地方自治者,其主治之人,必地方人民之所选举推之,中央政府从而授之,一也;于地方之制置,得以便宜为取舍,不必皆受命于中央政府,二也;中央与自治政府有要约权限,权限之外,地方可自适其事,三也。”<sup>[3]</sup>

译文增加了许多原著没有的内容,这使地方自治看起来不仅有利于地方,而且更有利于中央政府。随后严复又在这段文字后加上了自己的观点,讨论了地方自治制度与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和藩镇制度的关系。严复的译文既介绍了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又结合中国社会的国情,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勒弗维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中说过,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转化,它更是文化层面上的改写<sup>[6]</sup>。因此,我们认为严复运用求实创新的会通思想很合理地将原作的文化精髓转化为他关于救国的主张。从宏观角度讨论翻译,多数观点认为翻译是通过文字的传递达到文化层面上的交际与沟通,那么译者的意识形态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晚清译作大多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由于强烈的实用理性,导致译作“信”的失落。译著类似奈达的“文化翻译”,除了语言转化之外,原作中的文化语境大多被中国化<sup>[4]</sup>。翻译批评家们不关注译著的忠实程度,而更关注其社会效益,所以严复的翻译会通思想具有晚清的时代特点。

## 4 结语

严复的翻译会通思想继承了佛经格译和明代耶儒合译的优点,同时又具有功利的特点。其中,中西批判、集思广益和求实创新的思想是运用中国传统的知识,比附解释西方的科学,以求更好地传递信息,最终实现译者创新思想的表达。因此,佛经的格译方法和明末翻译的比附方法被严复灵活地运用,但是受到清朝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使其翻译会通思想的政治目的更加明显。

## 参考文献:

- [1] 王宏志. 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 [2] 张德让. 翻译会通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 [3] 王宪明. 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4] 廖七一. 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五四前后文学翻译规范研究[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 [5] 韩江洪. 严复话语系统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6]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责任校对 朱正余)